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 編

林慶彰主編

第30冊

章實齋經世思想研究

賴哲信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章實齋經世思想研究／賴哲信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 99〕

目 4+216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第 30 冊）

ISBN：978-986-254-359-7（精裝）

1.（清）章學誠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7.49

99016466

ISBN - 978-986-2543-59-7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 編 第三十冊

ISBN：978-986-254-359-7

章實齋經世思想研究

作 者 賴哲信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十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章實齋經世思想研究

賴哲信 著

作者簡介

姓名：賴哲信

生年：民國 43 年

學歷：

羅東國小、省立宜蘭中學初中部、高中部畢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

經歷：

板橋重慶國中教師

台北私立中興、延平中學教師，台北公立南港高職、中山女高教師

私立實踐、銘傳商專教師，私立輔仁、東吳，國立台灣大學教師

現任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教師

論文：

民國 95 年，讀寫合一的小說教學

民國 96 年，場面建構工具的設計

民國 96 年，韓碑的敘例與創例

民國 97 年，台灣新詩教育的耕耘面

民國 97 年，傳統劇種，行銷新貌——以阿忠布袋戲為例

民國 98 年，從流行到經典——談都會愛情代言人十一郎的歌詞藝術

民國 98 年，湊成華麗——明華園的舞台奧秘

民國 99 年，莊子的生活美學

民國 99 年，從事件晉身為史料的關鍵——權力、時間與互文

提 要

本論文以章實齋的《文史通義》為研究文本，以章實齋所處的乾嘉時期的考據風氣為學術背景，以道器論、經學、方志學、史學、文學、校讎學建構其學術體系，而以經世精神揭櫫其學術旨趣。

在實齋的學術生涯中，因為厭棄乾嘉學風一以考據為是，所以刻意回歸清初的經世精神，希望強化學術的濟世功能。他夠過系列著作，首先澄清方志學的本質，以為志書當作國史補編，當以記人傳事為寫作重心，希望讓志書在地理資料的寄存之外，更有歷史或政治的參考價值。接著他又拓展教讎學的範圍，想讓校讎包有目錄的性質，希望讓校讎學（其實應該是目錄學）具有思想史的功能，幫助讀者獲取更好的學習效果。隨後，他大量寫作史學論文以開闊志學的空間，加強了志書的寫作水準，也豐富了志學未盡周延的理論。而後實齋更繫文學於史學，以史學代經學，融史學、文學、經學於一鑰，展示了體大思精的學術格局。及至知命之年，實齋又提出抽象的道作自家學術的根本原理，以器為所以見道的憑藉，說明天下沒有可以背離人事的空理；同時並發表系列經說，提出古代官師確曾合一、六經皆史、周公立法而孔子

傳教的系列說法，讓經學就是經世之學的觀念益加顯豁，最後更自繫其學術淵源於浙東學派之中——實齋的諸多論題便這樣，隨著年齡的逐漸增長，逐層推衍完成。

以上是章實齋的成學歷程，但是本論文建構體系不依年之先後，卻依體系的構成講，所以先道器，而後經說、方志學、史論、文論，而殿以校讎學，以作本論文的架構。所以先道器論，這是因為章實齋的一切學說，都可歸約到他的「道借器顯」說。所以次群經說，是因為只有透過經論，才能將抽象哲學的道器論改用更通俗的學術語言已與世仁溝通。經說的精神在移經入史，而移經入史的思考方式須以實際的工作修志來落實，所以次之以方志學。方志學是實務，史學理論、文學理論、校讎學則是相對而生的方法，所以緊接其後以論述而足成之。

總之，本論文希望透過逐層剖析，將章實齋所以扭正當代學風的苦心，強調經世精神的熱情抉出，也將他在經學、史學、文學、志學、校讎學的成就與以表揚，當然在面對其理論缺陷時，也不吝於給予嚴正的批判，但期望能給章實齋和他的《文史通義》賦予一個恰當的學術定位而已。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節 章實齋的學術宗趣	1
第二節 章實齋的成學歷程	7
第三節 有關章實齋其人其學的研究	13
第四節 本論文的研究重點與敘述結構	18
第一章 以器明道的道器論	21
第一節 立說背景——反考據與求經世的需求	21
第二節 學說內容——以社會倫理為重心的哲思	26
第三節 結語——《文史通義》的基礎觀念	35
第二章 以經為史的群經說	39
第一節 立說背景——乾嘉經說以外的新路徑	39
第二節 學說內容	41
一、經史合流	42
二、經說	45
三、官師合一說	53
第三節 結語——治經所以經世	59
第三章 國史補編的方志學	61
第一節 立說背景——天資與環境的匯集	62
第二節 學說內容	68
一、方志學的本質	68
(一) 本質上屬歷史	68

(二) 作用上補國史	72
二、編纂方法	74
(一) 體式上別三書	74
(二) 資料上求詳盡	78
(三) 格式上要簡明	81
(四) 書法上期嚴謹	85
三、編纂制度	89
第三節 結語——纂史力求實用	91
第四章 融通尚用的史學	95
第一節 立說背景——實齋學術重心所在	95
第二節 學說內容	98
一、史學性質	98
(一) 範圍的界定——天下萬物盡史	98
(二) 目的的釐清——史學所以經世	100
(三) 發展史的敘述——史體代有流變	102
二、史學方法	106
(一) 史學的高下——各家成就有殊	106
(二) 史家的條件——史家需具四長	108
(三) 史著的條例——著史首重融通	111
(四) 著史的筆法——文法特重紀傳	124
第三節 結語——經世史學的代表	129
第五章 本史說文的文學論	133
第一節 立說背景——史學的落實與美化	133
第二節 學說內容	137
一、文學本質	137
(一) 文學生成——文學因道的作用而產生	138
(二) 文學功能——創作的目的在經世	140
(三) 文學特質——作品由作者的理性與情志見精神	141
二、形式發展	145
(一) 形式的必要——形式可以強化內容	145

(二) 形式的變化——形式代有因革·····	146
三、創作方法·····	147
(一) 創作法一：清真·····	147
(二) 創作法二：義例·····	150
(三) 創作法三：文德·····	153
(四) 創作法四：至公·····	154
四、批評原則·····	156
(一) 批評原理的說明——以道爲依據·····	156
(二) 文學史的建構——以史說文·····	157
(三) 韓愈對實齋的影響——蛻化自韓文 的文學理論·····	163
第三節 結語——實齋的文論是史論的翻版·····	164
第六章 辨章流別的校讎論·····	167
第一節 立說背景——目錄學盛行與編纂藝文書 的經驗·····	169
第二節 學說內容·····	172
一、考訂功夫·····	173
(一) 精密校勘·····	173
(二) 釐別名實·····	174
二、部錄原則·····	176
(一) 考鏡源流·····	176
(二) 釐分層級·····	182
(三) 周全部類·····	184
(四) 橫跨書籍·····	185
(五) 以義類書·····	188
三、檢索方法·····	189
(一) 建立眾序·····	189
(二) 善用索引·····	191
四、典藏處所·····	192
(一) 妥善藏書·····	192
第三節 結語——集大成的校讎理論·····	192
第七章 結 論·····	195
參考書目·····	207

緒 論

第一節 章實齋的學術宗趣

所謂經世思想，是一種以經世濟民爲主題的主張。它是中國儒家思想的重要傳統，是中國知識分子實踐人間關懷的途徑。它或以立德、立功、立言的型態面世，或以文以載道的言論出現，或以得志澤加於民的面貌呈示，或以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的抱負演變，它希望所有的學術都能有它的實際功能，而不僅是空疏的學理。

本著這種入世的精神問世，歷代學人志士在中國寫下了一頁頁璀璨的歷史：先秦諸子首先提出平治天下的計畫，漢代桑弘羊等繼續以經濟改革爲漢王朝提供了堅實的政經基礎，三國才士各爲其主奔忙，也爲天下生民請命，唐宋文人則祭起載道的大纛希望徹底修正文學的本質，宋朝慶歷改革與熙寧變法以務實的主張力求富強，永嘉學派主張義利雙行、王霸並進，清初與道咸年間的學者也紛紛爲經世濟民而努力，民國建國初期志士們勇於捐軀——雖然口號、行動不同，流貫著救世的熱情則相當一致。

經世濟民的理念，就如此地流貫在各朝代、各地方、各階層的學者與志士之中——即使是被清初學者譏爲袖手國事、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其實也是一種經世精神的展現。因爲宋明時期同論心、性、理的諸多學者同時相信，世人除了透過修身、齊家的途徑，不可能達成治國、平天下的責任；爲了救國救天下，他們要從修身養性作起；爲了透徹知曉人性所以誠、善的究竟，他們開始論心、甚至推到更抽象、更玄遠的理與氣。他們自有一番救世的熱

情，他們不只是玩弄光景。（註1）

只是明朝末年，學者因為救世心切，認為前輩精研的心性之學雖然崇高深妙，對於國事的振衰起蔽卻是緩不濟急。他們主張學者應當自學校挺身而出，當為國事、天下事憂心，如東林黨人；他們希望學術不只是說理論心，更主張學者有義務自歷史歸納出一套套實用的理則，提供給當政者方便取用的施政綱領，如清初四大家。一切學術不再純以心性修養為主體，他們一概朝著經世致用的實學方向邁進。

於是明末清初的學風展露一個基本意向，那便是崇實棄虛；而且對應於「空談心性」的毛病，一切說法都側重於現實社會事務。難怪葛榮晉先生將它稱之為實學，說這時期的學術「基本特徵是崇實棄虛，就是鄙棄空談心性，而在一切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提倡崇實，即實體、實踐、實行、實習、實功、實心、實念、實言、實政、實事、實風等等」（註2）——當時的學者確也是多朝著這一種經世濟民的軌跡前進，例如：顧炎武曾以《天下郡國利病書》揭露當時土地兼併、賦役不均的黑暗面，希望藉此提升國家的經濟管理水平；（註3）王船

〔註1〕 葛榮晉先生說：「『實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派和主導的社會思潮，發生在中國明中期至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三百年間，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明清實學思潮的產生，就其思想來說，它來源於宋明理學，而又對立於宋明理學，這也是毫無疑問的」，並舉出實證說，宋代學術在本體論上提倡實理說，在倫理道德上，程朱學派提倡躬行實踐，在經濟上提倡明道致用論，證明宋代果然已經帶有許多實學的因子。語見〈實學是什麼〉，《國文天地》六卷四期（1990年9月），頁74。

〔註2〕 語見氏著〈實學是什麼〉，《國文天地》六卷四期（1990年9月），頁78。

〔註3〕 另外顧炎武〈郡縣論〉說：「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明明是論政治制度的東西，在骨子裡卻透顯著對傳統說法的移易——《大學》八德目齊家治國一節常常引人疑竇。因為一個人固然能將家庭照顧得很好，卻未必保證自己便有機會出任官職，進行治國大業，並且將國家治理得很好。為了彌補這個命運上的限制，理論上的缺失，有學者主張這個家是指卿大夫階級，由士之自身到卿之家與諸侯之國，自是一階一階的升級，說來一點也不唐突，如徐復觀先生的《先秦人性論史》便如此主張。可是徐先生沒考慮到的是，這種說法固然顧及了家國之間的躍升，卻沒注意到誠正修齊的內在工夫，那這就不得不讓顧先生專美於前了。顧先生主張齊家之後所以能接治國，與制度無關，卻與執政者的心態相涉。顧氏以為，執政者能齊其家，並本著在家時候愛子之心，移來關愛人民，自然能治好國家。這種說法，比徐先生更精緻，更合理。

山透過研究歷史，寫出《宋論》、《讀通鑑論》，提舉許多有關治國平天下的建議以供當局借鏡；黃宗羲的《留書》、《明夷待訪錄》探討歷代治亂之跡，談論政治、教育、軍事、財政等關係乎天下興亡的重大問題，寄望後世明君能夠採行以濟天下，經世的意味都相當明顯。〔註4〕即使南明胤絕，教這批學者無可避免地成了先朝遺臣。可是家國顛覆的殘酷事實並沒有讓他們灰心頹志，反倒讓他們痛定思痛，更不自覺地將自己對家國的熱情，一概朝反對理學的方向作思考，認定宋明之亡於異族，和學者之專論心性有關。〔註5〕

這批學者反躬自省，他們質問自己，同樣是遵循聖人言語以治學，為什麼漢唐造就的是一番盛世，而理學學者卻會墮入虛無之途？他們懷疑，是不是近代學者對先聖先賢的經典詮解有了錯誤，才會讓原本可遠可久的聖書，卻對當世起不了一絲一毫的作用？從此他們開始想就古代的經典重新作詮釋，嘗試重新整理古代的典籍。這種回歸原典，面對真實的學風，由顧炎武在《亭林文集》的〈答李子德書〉之宣稱：「讀九經自考文始」，學界研考經書的風氣便算正式揭開了。〔註6〕

康熙中葉以後，窮經研古之風逐漸興起，其時閻若璩、胡渭並稱，同以考據名家。如閻氏主要著作有《古文尚書疏證》、《潛丘札記》、《四書釋地》、《困學紀聞三箋》等，並以《古文尚書疏證》推翻歷代迷信《古文尚書》的

〔註4〕 這種思潮，展現的面貌很多，有以繼承東林自居的，有以反理學為號的，有以復興古學為說的，而要以經世致用為主意。其中因為多以天下事為關懷重點，所以有人直以「外王經世」來稱呼這股思潮。如文大博士生黃尚信的論文《明末清初的儒學發展》便如此主張。

〔註5〕 陳祖武先生說：「清初知識界對理學的批判與總結取徑不一。顧炎武、王夫之等人，走的是對王陽明心學進行不妥協批坪的道路。而黃宗羲，則是以學術史的編纂，通過數百年理學發展史的總結，去彰明學術遞嬗軌跡。孫其逢、李顥、湯斌等人，卻又選取了會合朱陸學術的途徑，試圖以調停折衷去謀求學術發展的新路。錢謙益、胡渭、毛奇齡等人，則側重對宋儒經說的否定和漢唐著疏的表彰，而與理學分道揚鑣。獨有顏元、李塨、費密等人，對程朱陸王之學概與排斥，別闢蹊徑，溯源周孔，以六藝實學的講求而充分體現清初學術的批判理學精神。因此，就宏觀而論，清初諸儒的學術實踐，殊途同歸，從不同的側面，不期然而然地集中到同一個時代課題上來，這就是對理學進行批判和總結」。語見氏著《清初學術思辨集》頁292。

〔註6〕 顧炎武在學術上主張「博學於文」，他希望學者能由紮實的知識，做經世濟民的後盾。可是這口號稍稍一轉，便成為「通精致用」，再一轉，便成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考據路線了。也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學者多稱顧炎武為清代考據學之父。

錯誤，斷爲僞作，給《尚書學》，甚至是我國的政治學發動了一次極大的思想革命。因此得以被《四庫全書》尊仰，稱作考據學的開派宗師。胡氏的主要著作有《易圖明辨》、《禹貢錙指》、《洪範正論》等，將宋明以來以象數說《易》、迷信《書經》十六字心傳的種種理念完全推翻，所以也得《四庫全書》敬之爲「有功聖學」。不僅造就了一己的學術名望，也開啓了博稽經史的學術風氣。

這種學風讓當時的學者不知不覺的專務於經典的研讀，這種學風的研究方法也許精確縝密，現實功能上卻離人事越來越遠。前期學者重視經世濟民的實學走向，在此期不免有些迷失。因爲閻、胡二先生的具體成就，震撼了學界人心，讓後人發現，原來踏實的考據能顛覆空疏的講說，而且以爲必須有這種踏實的治學步驟，然後有堅實的學術成果；認定所有的經典，假若不經過這種考據工夫，學者所作的論述往往虛浮無妄；而所謂引經據典，只可能是挾經自重，硬將世人帶入萬劫不復的錯誤路徑之中，後果相當可怕。所以後繼者人人認可考據，以爲非如此治學，學難厚實；非講究考據，論難周延。於是考據學的風氣，便由此正建立了。〔註7〕等到江蘇學者惠棟崛起，獨張漢幟，主張：「經之義存乎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註8〕更明確地開啓了漢學的學術流派。〔註9〕從此，我們看到的是一大串的考據著作，面對的是一個個力學苦讀的士人，只見學者一意以鑽研經典爲掌握聖人精神唯一途徑，而不自知已經淪喪了治學的根本目的；他們乃將前期學者痛下苦功，專以提供當局行政長策，寄望後世昇平的熱情忘卻。

當這種僵滯的學術風氣已經傳開，加上幾場文字大獄接踵而來，更叫天下學者噤口，於是遂將清初活潑潑的學風，帶入一個僵固的隘徑中。從此考據鼎盛，即使面貌上有吳派、皖派或常州學派、陽湖學派的差異，但其後學，於經世濟民這一主軸，終是越流越遠，例如吳派以惠棟爲首，而弟子江

〔註7〕當然我不是說傳統以顧炎武爲考據學之祖的說法有錯誤，我只是說清初學界即使講考據，也一定有他經世濟民的意念在支持著，只可惜這條路越走越窄，於是後人只記得顧炎武的考音，卻不記得他的日知錄裡頭的考據多是以史學經世的條目。

〔註8〕語見惠棟《松崖文鈔》卷一〈九經古義述首〉。

〔註9〕錢大昕說清代至惠棟，然後「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備矣。」語見《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棟先生傳〉。

聲、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爲羽翼，專以尊古經、守家法爲究竟，格局較爲狹隘已不必說。皖派以戴震居首，戴震雖有義理頭腦，著作《孟子字義疏證》，提出「理欲不二」的說法，但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則將全副精力投注在文字、聲韻等訓詁中。吳派、皖派的學者終於把清代學風帶上更爲呆板的框限裡，而前期學者的經世理念至此蕩然，最後乃竟同時流露出一種只准全心鑽研古籍，人間諸事皆必暫置一旁的專側姿態。

所謂剝極必復，物極必反，再強勢的潮流裡，也會帶有反激的分子在。乾嘉學風因爲狹隘至此，於是想爲學術另找出路，認定埋首鑽研考據的同時，當昂首看看天下事務的想法也慢慢興發；而明末清初諸大儒所主張：爲學必需有益於世的觀念，也如春風拂過雪地，綠芽紛紛冒出一股，又在繼起的某些學者心中慢慢孳長。而浙東學派後勁，如邵廷采，如章實齋便是一個個鮮明的例子。

邵廷采深信「儒者之學，固以經世爲驗」，〔註10〕以爲君子立說，不可背離人生。在他的一生中，雖然沒有機會落實理想於現實，卻終以紙筆，留下十二篇的《治平略》和六篇《史略》，記錄個人所有的思想精華，以供後人採擇。章實齋推尊邵氏，〔註11〕也對當代質實的學風感到不耐煩。並藉著邵氏的提引，繼續宣揚學以經世的主張，大步地跨過了乾嘉學者專事考據的泥淖，遙接到清初最質實的經世學風。〔註12〕

當然，章實齋因爲出身於考據盛行的乾嘉時代，所以他的論題也跟當代重合；例如時人有目錄學的著作，章實齋也有與之相應的校讎理論；當時最盛行的是經學，或由經學延續出來的史學，所以章實齋也有多篇討論經學及史學的文章；同樣的，當時流行方志學，所以章實齋也有方志理論；而文壇主流是桐城派，所以章實齋也自有與之相對的文學理論。只是因爲章實齋有特異於時趨的經世理念在身，因此即使有與當代相同的論述範疇，卻有與時

〔註10〕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論曰〉語。

〔註11〕實齋曾經跟邵晉涵褒獎邵廷采的《思復堂文集》，以爲作品在子史之間，高過一般文人，乃五百年來所罕見。事見《文史通義》〈邵與桐別傳跋〉。

〔註12〕吳志鏗云：「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及家學淵源的影響，廷采的著作綜合史學與理學爲一體，即藏理學於史學。他的著作特色雖與當時學術思想發展的新潮流——藏理學於經學大不相同，卻都是時代潮流的產物……按理應夠資格成爲一派宗師，惟其局面不夠闊闊，學術成就有限，故終爲主流派所淹沒。不過後來章學誠得其啓發，終能另創新局」。語見氏著〈邵廷采的史學〉，台北師大《歷史學報》第十七期結論部份。

人有不一樣的論述觀點。

他以爲部錄群書除了能夠方便讀者尋索書籍以外，還需要帶有思想史的功能，讓讀者在尋索群書的同時，能同時獲得一種清楚的學術流變大綱——這是他對校讎學的特識。他認爲方志學必需有益政治，還須具有史料的特質，可作國史補編——這是他對方志學的基本主張。在方志學與校讎學都已成熟之後，章實齋更順著天性，朝著史學鑽研下去，提出了：纂述史著必需具備才學德識的修養，史著須具經世的功能；爲了強調經世的作用，章實齋又主張敘述時要略古詳今以與古史互補，體例上要採用通史以豐富史料；爲了方便讀者的研讀，章實齋更主張兼融各體，博採各家之長，以利歷史事實的鋪陳；主張敘述時無妨善用目錄與自注，以便世人研閱；倡議修纂《史籍考》這種宏編鉅著，以收納史料——這是他的史學論述。（註13）

爲了強調史學的重要，他將史學與文學劃分爲二。他根本不給文學以獨立的生命，所以當代提出的性靈說、肌理說，甚至是評點學文的教學方式他都認爲不是正理。他批判袁枚、方苞等人，說他們學說有缺失，人格有缺陷，並不僅因爲對他們的修養有不滿，更主要的理由是因爲他們對文學的獨立價值，在判定上有極大的歧異。他以爲文學只是爲傳記寫作而存有，假若不是爲了替史學、爲人世而服務，它根本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章實齋對文學的地位相當壓抑，他要文學完全屈服在實用之下。他的文學理論終究只是依著史學理論而衍生，而文學到底也只是史學的附庸而已。

而對經學，章實齋也貫注實用精神在其間。他論《易》、論《詩》、論《書》、論《禮》都著重在他的史料義或實用義，和一般學者之齷齪於校讎的瑣屑不同。他說述《易經》本質時，提出了六經皆史的口號，著重它明時改制的應世義；論《詩》時又以文學史的觀點來解釋《詩經》的背後意義，有強烈的史學意趣；論《書經》時，章實齋界定經書的本質爲可作行政參考、人世借鏡的政府檔案或史料，極力想將經書的本質扭作史料，有將經學收納到史學之中的野心；而且在文中，章實齋還自古而今地就各本史書分體分類慢慢敘下，將之當作是在寫作一篇史學史以及史體辨析的論文。至於論《禮》，更就

〔註13〕 章氏天性傾向史學，所以讓他的研究多以史學爲重心。他未弱冠就在史學上有特出的表現。他在〈家書三〉上說自己在十五六歲時，就「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史體」，直「若天授神詣」；又因爲父親身爲縣令，讓實齋得有機會助纂縣志，促成實齋以方志學與校讎學爲發端的學術走向——先與友人論修志，並在四十二歲以前，完成了《天門縣志》、《校讎通義》等重要著作。

《周官》溯源，說明各種學問都必需與人事有關，凸顯經書的實用意義，同時糾正當代鑽研學問卻不留意民間疾苦的疏失，經世的意趣最是明顯。

章實齋在論述經學時已經將他的學問宗旨制定作經世與實用，可是卻未曾說明他的學理依據。直到他寫作〈原道〉時，才提出道字作他的根本理念。認為產生萬物的形上根源是道，一切學問離不開人事，也不應該悖離人事。偉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掌握到這個自然之脈動，與道這個引動天下萬物的根源力量相合，並以之處理當世事務。在章實齋的想法裡，道器終需合一，並以爲治學必不可離開人事。

章實齋這種思想架構的精密度與開闊度，已自特出於當時，而以實學經世作個人學術的主軸，賡續前清學者的精神，啓迪道嘉以下的經世學風，在專重考據的乾嘉時代，實有承先啓後的特殊意義。

第二節 章實齋的成學歷程

章實齋的思想歷程可以分作醞釀期、奠基期、立教期、尋根期四個階段。

一、醞釀期

章實齋幼年愚騷，在十六歲時因父親的指導，開始對史學有所體悟，引發對史學體例研究的高度興趣；〔註14〕二十歲時，又因爲父親的教誨，對文學賞析有了更深一層的領會；〔註15〕期間更因爲自家對《韓昌黎集》的深度

〔註14〕他在〈家書三〉說：「十五六歲時，嘗取《左傳》刪節事實；祖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材，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吾於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史體，遂若天授神詣，竟成絕業」，說明實齋幼年即有鑽研史學的性向，而其繼續朝向史學發展，跟父親（〈家書三〉是一封實齋寫給兒子的信，所以所謂祖父，便是實齋的父親。）的適時啓迪與鼓勵，有很大的關係。又，實齋爲他的老師柯紹庚先生作〈柯先生傳〉傳，傳文說：「學誠年十六……不肯爲應舉文，好爲詩賦，不得其似，又編纂春秋家言，戲爲紀表志傳，自命史才」，前半說他不屑爲時文的史學傾向，雖然喜歡文學，卻無法深入體會文學技巧的窘澀，以及，就《春秋》作《史記》，化編年爲紀傳的嘗試。以時間與作爲來說，這和他在〈家書三〉中敘述的受教於父親的事件是相同的一件事。可與此事相參。

〔註15〕實齋在〈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書後〉裡說自己在十九歲時，對文章之美仍然不太能夠體會。那麼他對文學的領悟是在什麼時候才開竅的呢？實齋在〈家書三〉篇尾裡說：「猶記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

喜愛，引發了一己學以經世的基本理念。〔註16〕章實齋各種研究路徑的確定，以及自信的產生，都是在這時期醞釀出來的。

二、奠基期

在這個時期，章實齋用〈答甄秀才論修志書〉展露個人方志學的理论雛形，他在答〈甄秀才論修志〉（前後兩封書信裡提到的志學理論重點有以下十幾條：

1. 志書本質仍是史書而不是文學書籍，所以當重史料的搜集，而不只耽溺於文采的展示。
2. 志書寫作的主要目的在經世，基本的功能是可以直接移作國史補編。
3. 爲了方便國史取材，所以志書當仿正史體例，直分紀、傳、考、譜四體。
4. 紀、傳、考、譜四體其實只是本紀、列傳、書志、表的異名。所以同實而必需異名的緣故，是因爲章實齋認爲朝廷是最崇高的權力中心，他們所撰述的正史是史書的最高級著作，一切史學著作都不可以侵犯到他們的尊貴性，所以章實齋說：方志當避國史之名。（其實章實齋立志爲史臣，也是這種敬仰朝廷之心的投射。）
5. 紀、傳、考、譜四體之外可以另立文徵。既以擴充史料，也使文字爽淨。
6. 志書以地理爲重心，數十年再一修。國史記事時間跨一代，既經寫定，不再更革。

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吾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爲訓詁牢籠。」說明：他對文學美感的初次體悟，是在他二十歲那一年；而引導實齋進入文學美的殿堂的人，仍然是他的父親——實齋的父親章璠衡先生可算是實齋成學經歷中，影響他最大的一個人。而實齋也因為這次經驗，稍稍能在專重考據的時風中，更具自信地自我挺立出來。

〔註16〕實齋在〈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書後〉裡說：「余家所藏韓文四本，此本最爲流俗通用……先君丹墨評點，指示初學爲文義法，小子自幼習焉……憶此書乃甲戌秋冬所購，是時先君方官湖北應城知縣，塾師於舉業外，禁不得閒省他書；及得此集，匿藏篋笥，燈窗輒竊觀之，初不盡解，頗愛好焉，不忍釋手」。如果我們要作章實齋的古文這類論文題目，韓愈當然是實齋古文淵源的不二人選。由於韓愈的文學主張是文以載道，所以實齋思想主軸的經世說，可能也是由韓文紮根的——因爲在實齋成長的時代，史學風氣早已隨著《明史》的完成而轉入考據去了。